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四十三期（总第 293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8 年 4 月上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2007 年 6 月 5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在改革开放的第 30 个年头，如何以解放思想的精髓来为可持续发展找到现实落脚点，这不仅是广东需要面对的课题，也现实地摆在整个中国面前，摆在盐城八百万人民面前。

2008 年 4 月 7 日到 9 日，胡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胡锦涛来到黎族村民苏就清家中，进花圃、试沼气、看家畜，了解他家生产生活情况。当苏就清表示希望中央支农惠农政策不要变时，胡锦涛接过话头说，中央的政策应该变，要越变越好，让广大农民都富裕起来。总书记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怀笑了起来。这同时也引发人们深思，从不变到变，这是从上到下在观念上的巨大飞跃，可要真正实践起来，又是多么地不容易。盐城市“深入解放思想、推进科学发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推开。本刊推出“广东又见解放思想”专题，以供各位领导决策时参考。”专家高论”和“他山之石”栏目也是围绕本刊专题展开，但愿能为您提供更广阔的视角。我们祈盼听到您的声音，也乐意为您提供定题服务。

要 目

● 本期专题：广东又见解放思想

广东已被逼到了不转不行的地步

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

强调“先导意识”突破特区之“忧”

● 专家高论

勿忘改革之由

以思想解放促和谐文化建设

● 他山之石

浙江有 27 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武汉 22 条新政点燃全民创业激情

● 本期专题:广东又见解放思想

广东已被逼到了不转不行的地步

一本书、一份报告,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拿在手里的这两样东西,成了广东省各级干部的案头必备。书是陈开枝写的《1992 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报告名为《2007 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前者,汪洋援引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的嘱托:“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后者,用数据来增强与会者的忧患意识。

《2007 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的执笔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7 年 12 月底,他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要他准备 800 份报告,用于几天后的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丁力后来得知,他这份被汪洋频频引用的 100 多页的报告,是会议的一号参阅材料。

其实自 2002 年启动的“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并不算新鲜出炉,甚至数年来它的结论都有相似:虽然经济总量一直排名第一并不断上升,但广东的人均 GDP 却落后于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2007 年的报告显示,除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尽管综合竞争力广东名列第一,但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浙江,综合发展后劲山东则拔头筹。“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之后,广东在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下,正步入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传统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曾在浙江大学任教的丁力分析说。

事实上,《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中的主要控制性指标两年前就已失守:2006 年广东全省建设用地为 162.55 万公顷,提前 4 年突破了 2010 年规划用地目标 158.26 万公顷;而耕地保有量目前比 2010 年目标已少了 279.8 万亩。加之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能源供应持续紧张等,“我个人认为,广东这种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为主的外源型经济只能再持续 5 年。”丁力说,提了十几年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不能实现,主要就是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与

过去不同,广东现在已经被逼到了不转不行的地步。”2005 年上半年,广东省经济一度出现下滑,7 项重要经济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长黄华华直言“形势严峻”。此外,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和复杂,例如近年一再受到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报酬在广东财富分配中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60.58% 下降到 2006 年的 38.69%。“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沪苏浙等省市相比,在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人，重用什么人，淘汰什么人，关系重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锻造干部队伍，最重要的导向就是要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怎样把干部的思想观念转到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干部怎么配？人才怎么选？党组织怎么干？这些都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必须抓紧研究的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人，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在配好班子、选准干部、用好人才上下功夫。重用什么人，淘汰什么人，关系重大。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选干部、配班子、聚人才，真正把那些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进各级领导班子，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干部和人才保证。

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问题上，思想要解放解放再解放，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点。“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注重选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形成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正确导向，鼓励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到基层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加深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使基层一线真正成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

用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标准选人育人用人，这是对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思维水平进行锻造的过程。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我们的干部队伍经历了洗礼，经历了锻造，“不换思想就换人”，使我们打造了一支能适应市场经济大潮的干部队伍。当然，锻造的过程是艰难、痛苦的，但也是新生的开始，是希望所在。这就像凤凰涅槃，凤凰在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后，获得新生，并在新生中达到升华。

锻造干部队伍、推动科学发展的基础是要完善机制，特别是建立健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考核办法，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和要求转化为可考核的客观标

准，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和监督作用，把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上来。通过科学的考核，切实考出压力、考出动力、考出方向。

“大浪淘沙始见金”，我们的干部如果能适应这种锻造，就能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就能茁壮成长起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不适应这种锻造，就不能领导科学发展，就会落伍于时代，并最终被组织调整，被社会淘汰。总之，围绕推动科学发展锻造干部队伍，最重要的导向就是要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人民日报》）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强调“先导意识”，突破特区之“忧”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个外来人口远远多过户籍人口的特大城市。历经近30年的高速发展，如今的深圳已经走到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分组讨论中说，汪洋书记的报告“振聋发聩”，用世界的眼光全面分析了广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这对于深圳的发展至关重要。

26年来，深圳的GDP每年增长迅猛，亚洲四小龙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许宗衡说，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但深圳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管理却相对滞后。比如医疗保障，深圳的市一级医院集中在罗湖区和福田区，其他四个区没有一个市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市民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再比如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深圳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跨越发展，但高等教育和产业还没有完全紧密结合起来，中小学的均衡化和优质化发展也有很大差距。

同整个珠三角一样，深圳也面对着人口问题的困扰。许宗衡表示，去年深圳户籍人口189万，常住人口达到了846万，实际管理规模超过10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甚至接近香港的水平。“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完成人口转移。”

即使在经济发展领域，深圳也存在隐忧。许宗衡介绍，去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6300亿，但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把握在我们手上的不多，“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在帮人家打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还存在结构不够优化的问题。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90%是IT产业，IT产业很“轻”，转移和漂移的可能性很大，如何解决产业的适度重型化？这也是我们深圳所要面临的现实。

另外，深圳是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但许宗衡指出，城市的二元化、特区内外发展的不协调已经非常突出，特区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如何提高特区外的发展水平，推进城市的一体化发展，成为深圳的突出问题。”

针对上述这些“担忧”，展望未来的发展，许宗衡强调了深圳的先导意识。他说，解放思想就是我们未来工作的先导。这是基础，是关键，也是核心。这个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解放思想不同，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30 年来，人们的思想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当一片繁荣和继续高速发展的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观念和姿态来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对广东、对深圳的发展至关重要。

广东贸易厅厅长梁耀文：广东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改革开放近 30 年以来，广东抢抓国际产业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机遇，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突破 3000 亿、4000 亿、5000 亿美元大关，今年有望突破 6000 亿美元大关，吸引外资在近年来也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广东外经贸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内部来看，人民币不断升值，土地、劳动力资源日益短缺，国家不断调整相关政策；从外部来看，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石油等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一系列因素对外经贸大省广东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可以说，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形势下，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广东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刻不容缓。

现在广东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香港、欧盟等。与此同时，外经贸在全省各个地区发展也很不均衡，珠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和吸引外资总额占全省的比例分别高达 95% 和 90%。还有一些数据也能说明问题，如目前我省外贸中加工贸易占 65% 左右，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 80.4% 以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中，贴牌生产的产品占 85% 以上；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投资企业占 80.4%，凸现出我省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

虽然整个制造业在规模上占据优势，但全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 10%，广东也相差无几。

如何谋划对外开放的战略转型？广东必须树立世界眼光，从战略思维角度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是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要通过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加大力度引进服务业来向高端发展；认识到自己有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要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认识到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主要依靠“引进来”，还必须更多地“走出去”，实现两个市场的统一、两种资源的协调。

深圳的企业生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员工跳楼事件，这让一向备受关注的华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2月26日，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跳楼身亡，后经查是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张立国跳楼自杀，具体原因警方尚在调查中。据悉，去年以来先后已有5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有华为内部员工甚至统计出：这已经是近期华为非正常死亡的第38例了！

随着华为员工的接连跳楼自杀，一时间，对华为公司“吃人的狼性文化”的批判声汹涌澎湃。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起员工自杀事件和华为公司高强度的工作与近乎残酷的管理有直接关联，也许其中有着员工在个人生活方面受挫折、心理素质差等因素，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华为公司，进而妖魔化，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但事实上，自杀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华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深刻烙印。“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环境窒息”等华为身上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同时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珠三角(以深圳为代表)企业的一种生存状态。面对这种状态，华为及同类企业应该对其用工制度及企业文化进行必要的反思。当前，各地政府纷纷兴起解放思想热潮。对此，企业也不能置身度外，作为一个追求发展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良好的工作环境、温馨的情感氛围、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谐的企业文化留人、用人，才能更好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领导决策信息》第12期)

● 专家高论

勿忘改革之由/胡舒立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1978年底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

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参见《财经》年刊“2008：预测与战略”吴敬琏“响亮的回答”一文）。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原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参见本期“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 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渐次冲过 10000 美元大关；而到 1978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 148 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 260 美元、印度的 248 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 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 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 1978 年到 2006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13.3 倍，年均增长 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 3% 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84 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 5.7 倍；农村贫困人口从 2.5 亿减少到 2000

多万。诚如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形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2008 年第 1 期《财经》杂志）

以思想解放促和谐文化建设/钟晓毅

又一年春早，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广东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先行一步，在困难重重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奠定了今后发展的良好基础，让国人和世人瞩目，和谐文化的建设也呈现了与和谐社会相伴而至的融和。三十年的风雷激荡，三十年的风雨兼程，我们收获良多，但也挑战无限。现在正临一个关键的时刻。正如省社科院梁桂全院长所直言的：“必须清醒地看到，广东存在被相对边缘化的可能：珠三角、广东在全国发展中的地缘经济区位却在相对下降，正面临着来自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的挑战。”

广东能否保持和提升在全国的排头兵地位，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再及时地来一场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保持清醒头脑，看清牵动下一步广东和谐社会发展全局的纲在哪里。纲举目张，抓纲就要求立足全国，放眼全球，把握规律。如果只站在自己家里，盯着 GDP 增长自我陶醉，而不考虑国家环境和世界变化，不考虑广东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扮演的角色，就不能抓住发展全局的纲，就不可能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不可能建设一个和谐、和洽、和顺的广东。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倡导的是“见物也见人”，而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两者是相促相承，相融相洽的，都指向了以人为本的、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目标，所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

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摒弃的是“新瓶装旧酒”,注重的是创新精神。既然广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广东则应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新跨越闯出一条新道。和谐文化的建设要为此保驾护航,既要确立新的战略思维,又要抓制度创新,让整个社会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制度预期,这个制度创新当然包括文化、理念的创新。广东省委、省政府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基础,提出文化立省的战略,就是通过文化发展与文化变革,再造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大省,指引广东文化新的发展及文化形态新的变革,全面改善和提升现代化发展的水平与素质,并借助优势文化平台,全面提升广东的综合竞争力,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呼唤的是集体的智慧、共同的激情,同心协力,再创新高;和谐文化的建设,需要的也是构建健康向上、协同进步的文化体系,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重在建立先进的精神文化内核;精神文化内核是从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升华、提炼、凝聚而成的文化精华,是一种时代精神,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行为和发展方向。而从文化的内在结构看,和谐文化又指诸多文化要素或文化成分既对立又统一的协调平衡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多元共存、协同有序、良性互动,充满活力,正好吻合当前思想大解放,推进大发展的战略思维。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注重的是不可浅尝辄止,不可急功近利,而是要深化推进,不断开拓。如果说,当年思想解放、改革先行,凭的更多的是一股闯劲,一腔勇气,主要是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那么,今天再提解放思想,则更多需要理性,在科学理性的引导下,广开思路,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检讨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突破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从杀出血路到闯出新路的升华。和谐文化的建设,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大力研究、倡导和宣传和谐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更坚定的思想基础,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矛盾,鼓励一切有助于促进和谐的思想行为,不断增加社会生活的和谐因素,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和谐的各种法律的、制度的、道德的规范体系,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呈现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团结和谐的局面,使广东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

风起南方,领跑南方,广东曾经是改革的试验场,曾经为中国杀出了市场经济的血路,今天,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中继续先行一步,同样需要闯出一条新路,解放思想的力度决定广东改革创新的程度,同时也推动着和谐文化的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让我们从

解放思想再起步,由此去推动广东的大发展。(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哲文所所长、研究员。来源:南方日报)

● 他山之石

浙江有 27 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省率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农村、政府四大领域的改革。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消息称,据初步统计,浙江有 27 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介绍,浙江省经济领域改革在全国领先的有 7 项,包括率先出台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and 壮大。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浙江企业占到 203 席,居全国首位;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率先基本完成;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革全国领先,全省共有上市企业 150 家;率先推进商品市场建设和改革,始终保持市场大省地位;率先在全省全面实施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率先探索排污权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进程领先,全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列全国第 3 和第 2 位。

社会领域改革在全国领先的有 11 项,分别是率先构建覆盖城乡大社保体系,率先建立企业全覆盖的养老保险制度,率先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率先建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制度,率先建立城乡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率先建立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制度,率先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制度并对省内就读农业种养技术专业类的本地大中专院校学生免收学杂费制度,率先推进公平教育体制改革,率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率先建立省级和杭州市药品联合集中采购制度。

农村领域改革在全国领先的有 4 项:率先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创建“政府推动+农户自愿+市场运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创建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制度,率先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城乡统筹水平综合评价制度。此外,政府领域改革在全国领先的有 5 项,即率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率先开展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强县扩权改革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率先建立了化解乡镇债务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降低乡镇债务;率先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率先建立门类齐全、运作规范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新华网岳德亮)

浙四城成立环保专委会,打造都市经济圈绿色屏障

去年年底，杭州都市经济圈市长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这也标志着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四城市联手打造杭州都市经济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四座城市自愿组成了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发展协调机构。毛晓园告诉记者，以往四城跨区域、边界环境纠纷很多，特别是萧绍边界、余杭德清边界、余杭海宁边界等边界环境污染严重，管理存在漏洞等等。“环保专委会成立后，杭、湖、嘉、绍将制定区域边界环境联合执法制度，以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区域流域水源地沿线重点污染企业、跨区域环境违法企业为重点，专委会每年组织部少于四次区域边界环境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毛晓园表示。

为了确保杭州都市经济圈出境断面水质达标，专委会每年还组织开展对各地主要出境断面水质达标情况进行联合考核。“建立环保专委会，就是为建设杭州都市经济圈设立一道绿色生态屏障。”毛晓园最后说。（《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12期）

武汉 22 条新政点燃全民创业激情

对想创业的武汉百万市民来说，如今准入条件更宽了，门槛更低了，规费更少了；对企业来讲，则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和环境。笔者近日从武汉市工商局获悉，该局已出台《关于促进全民创业的实施意见》，集中推出 22 条综合性“体贴”服务新政。“八大放宽”降低创业门槛，推行网上登记年检搭建创业平台，实行并联审批优化创业服务，分级监督管理保护创业环境。

22 条新政的最大亮点，是率先推行“先发照后审批”的便利举措，避免了以往多部门审批的“怪圈”。同时，工商部门还出台了放宽投资主体、出资方式、出资额和时间、名称登记等的一系列举措。据了解，这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现行《公司法》的细化探索，也是武汉作为城市圈改革试验区的创新举措。

一直梦想创业的项雷看到这些新规很是惊喜，他说：“我一直想开一家软件销售公司，但苦于资金压力。现在看到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都可以作为注册资本，让我看到了创业的希望。”武汉天下置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少力表示，这些规定对创业者很宽容。新创业者对市场不了解，抗风险能力较弱，多一些扶持将有助于他们发展。业内人士称，这 22 条新规的出台，必将掀起江城市民更大的创业热潮。据了解，这 22 条措施已在武汉全面施行，并将视情况向城市圈内其他城市推广。

领导批示

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很好！工商局见识早、反应快，值得肯定。

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市工商局制定的促进全民创业的实施意见很好，望抓好落实，并不断解决创业中的新问题。

专家观点

区域经济专家吴传清：全民创业亟待建立全套政策体系

“22条新政，让人大感鼓舞，不过目前更需要政府从全局高度搭建鼓励创业的政策框架。”昨日，武汉城市圈区域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吴传清表示，武汉提出要建创业之城的目標，然而与广东、浙江沿海等地相比，目前最欠缺的是一套符合实际的政策体系。

吴传清教授称，这一整套政策体系，不仅要讓创业者获得市场准入资格和公平对待权利，还要尽可能提供便利解决他们资金、市场、甚至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创业活动是动机、技能和机会相结合的结果。因此，促进创业的政策应从这些因素考虑，至少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将全民创业纳入武汉城市圈内经济发展战略内容，详细编制相关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减少税收及降低制度要求，降低创业成本；鼓励商业银行为创业企业进行融资、贷款，并设立种子基金等项目；搭建创业企业与大学及相关的研究机构之间的研发平台；建立鼓励创业者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险等方面解决后顾之忧。

创业新政解读

22条新政，将给江城百万创业大军带来哪些变化？赵在俊进行了权威解读。

“先发照后审批”是最大亮点

“过去创业，尽管市场放开了，但实际投资中总会遇到一些‘玻璃墙’，让你看得见，进不去。”赵在俊举例说，民营资本要想开一家客运公司，过去工商局要求先办运输许可证，才发执照，而公安交管部门要求有营业执照才能办运输许可证。

据了解，这类审批“怪圈”多出现在一些国有垄断性行业中，已成为全民创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所幸，这些在武汉已成为历史。22条新政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先发照后审批”，让创业者先把公司办起来，再去办相关资质审批，率先解开行政审批的“死结”。

实行“先发照后审批”后，若申办公司的经营范围需前置审批的，工商部门将先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半年的临时营业执照，公司可凭此去办理各项审批手续（项目涉及安全、环保、节能审批的除外）。“但是，临时营业执照仅供筹备用，不能违规用于对外经营。”赵在俊表示，这是为了避免企业恶意逃避审批义务。同一地点可注册多家公司

只有租房的创业者，也可以开公司了

“一套三房两厅，理论上都可以申办5个公司。”赵在俊称，以往申办企业，必须提交单独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往往一个地址只能注册一家企业。新政放宽了场所登记限制，允许经过物理分割的同一法定地址注册多家企业。此举也是为了鼓励市区内写字楼推出创业园区、创业聚集地，帮助上下游创业企业“零距离”搭配。

房产证、股票都可以作价出资

启动资金不足，是横在江城大多数创业者面前的共同难题。此次新政极大放宽了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的限制。新规提出，所有符合条件（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都可以作为注册资本登记（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过去注册一般要求货币和实物，且货币占比不能低于30%。现在都不受限了。此外，内资企业在法定期限内资金未全部到位的，经相关审批后可延长一年。高校毕业生、归国留学人员、下岗失业人员、退伍转业军人开办科技型、环保节能型企业的，其首期出资额由20%放宽至10%，但最低不少于3万元。

个体户也可冠市名

即日起，江城41万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可免费使用“武汉”这个金字招牌。

赵在俊介绍，新政放宽了名称登记限制，投资主体可自行选择规范的企业名称、字号；凡依法申请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均可冠市名。出台这规定是为了清理过去在公司名称上人为设置的障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此外，凡注册资金在2000万元以上，且公司经营范围中包含3个以上国民经济大类的，允许名称中不反映行业特点，使用综合类公司名称，鼓励企业多元化发展。

启动股权质押融资新渠道

江城7万多家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有了融资新渠道——通过股权出质登记，从银行、担保公司或个人获得贷款。武汉中小企业创业，缺乏资金，而一些银行存款多于贷款，钱贷不出来。目前，企业融资主要通过房产质押或担保贷款，方式过于单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信用环境治理办公室主任傅承骏也认为，一些企业有着很好的信用和前景，贷款时却拿不出抵押物，达不到银行的信贷门槛，融资难度很大。为此，新政打破困局，出质人和质权人只需到工商部门将约定的股权登记，就可质押融资。

城市圈农产品企业可在汉合作注册

城市圈内农产品企业，可通过联合方式在汉注册。据赵在俊介绍，武汉城市圈内可在汉联合申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意味着，在武汉市内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成成员，可以是城市圈内同种、同类农产品生产加工的经营户。对农民从事自产自销非加工农产品经营活动

及农村经纪人，是否工商登记可自主选择。此举将聚集圈内有意投资农业的创业者，支持其做大做强。

太原人大探索立法招标

规避部门利益

在至今执行的程序中，立法工作仍普遍采用人大起草或委托相关部门起草、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模式。“一直沿用的习惯程序，造成的后果是，部门规章乃至一些行政法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部门、行业利益的色彩，缺乏公正性。”何建华副教授如是说。

事实也如此。2007年，太原市劳动保障部门起草了《社会保险条例》，提交人大审议。但在初审阶段就被要求重新修订。“在最初的《社会保险条例》中，大部分都是针对如何征收、征缴社会保险金的内容，考虑的是本部门的权利和利益，而没有体现出百姓的利益和对自身的监管。”傅建荣告诉记者，人大经过审议，最终要求制定部门从社会保险金的征缴、社会保险金征收部门的服务、社会保险金的监管3方面重新修订。

“法律本身就是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傅建荣说。他认为，以往的部门兼任立法者和执法者双重身份，造成立法部门化、利益化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对法律公正性要求也日益趋高，从而决定着在立法工作上也要达到公平、公正，避免部门立法出现利益化。

虽然此次采取社会招标立法的目的，并非是出自对部门立法的不信任，但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文化产业部门利益化的程度。根据太原人大的招标公告和设想，从处于中立方的投标单位中选取两家起草两份方案，而同时，太原文化广播电视局也起草一份方案，最后由市人大进行汇总，合成一份草案，并提交审议。同时，为了避免在起草过程中，中标单位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市人大也对文化广播电视局提出了要求：尽量满足中标单位提出的全面了解太原市文化产业现状的要求。事实上，对于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法律支持的问题，太原文广局也迫切渴望一部完善的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出台。

在承诺向中标单位提供全面材料的基础上，吴国荣局长还提出了积极参与竞争的态度。“不仅要积极竞标，还要结合实际工作和发展状况，广泛收集、整理、提炼国内外有关发展文化产业的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提出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方案。”

而参与投标的单位，也都对完成《条例》草案自信满满。

对文化产业颇有研究的何建华副教授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作为研究课题，高校的专家更具有专业性，也具备公正性。相信我们制定出的草案将更能满足太原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

“不管是高等院校还是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政府法制办，都是从社会综合利益去考虑，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文化部门是从专业部门的角度去制定条款。双方的汇总将更全面地体现出一部条例所应囊括的各个方面。”傅建荣对于《条例》的质量，充满信心。

形成一种机制

开门立法，当下已成为各级立法机关实践民主参与立法工作的原则。2001年，《婚姻法》进行修改，并向社会公布修订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果反响强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来函3800余件，既有个人想法，又有普遍问题，甚至有人将修订案草案逐条修改。

之后，全民参与立法的热潮在全国传开。“最开始提出百姓参与立法时，也多是将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傅建荣介绍说，“后来，随着国家对民主立法的进一步要求，邀请群众参与立法听证、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等方式，都有地方立法机关进行尝试。”

而对于这次《条例》草案的招标，傅建荣一再强调是在探索立法改革。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荣怀则如是介绍《条例》草案招标：“主要是希望借此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经验，拓宽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让广大市民参与到立法前期进程中。同时在立法中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力量和智慧，真正将其打造成为一部百姓法规、阳光法规、民生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太原市民享有更多文化欣赏和投资产业开发的权益。”（民主与法制时报）